
主持人语

自公元前 2 世纪始，中印两大文明就有了文献记载的交往史，没有记载的交往史更早。在几千年的交往过程中，两大文明有过碰撞，但更多的是交流和融合，印度的精神文化如佛教、天文学等丰富了中华文明，中国的物质文化如丝绸、白糖、茶等丰富了印度文明。然而，进入中世纪之后，由于诸多外力因素，两大文明交流趋于减少，甚至中断。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印两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交流，其间有“中印兄弟阶段”，也有“中印冲突阶段”。2020 年上半年以来，中印关系再次急转直下，负面趋势至今不减。但探究起来，中印两国虽有“结构性”的边界争端，却也有“误读性”的理解问题。因此，我们举办此次工作坊，从中国人看印度和印度人看中国的视角尝试性地议论中印当下问题，试图找出某种“动因”，以解读中印之间的“误读性”理解问题。

与会者分别从印度看中国和中国看印度两个方面进行了发言。首先从印度角度看中国，与会者认为：

1. 印度以臆想角度看待自己，力图把中华藏文化纳入印度文化圈，并辅以相关行动，比如以印度传统医药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藏医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试图将中国藏南、不丹、锡金、尼泊尔和拉达克等藏传佛教区域连成一体；编订涉藏内容教科书等。上述行为目的是炮制印度文化圈内的佛教文化板块，进而推进西藏“分立”的“实际”。

2. 视中国为自身发展对手，改变原有的不结盟政策为有选择的结盟政策，乃至多向结盟政策，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协助西方势力遏华，并试图趁势发展自己。

3. 视中国资金和相关实体为印度经济发展的阻力，不公平地对待中国经济和相关实体（比如华为、中兴等），强行与中国经济进行硬脱钩，损己害华。

从中国角度看印度，与会者认为：

1. 戴着有色眼镜看印度，认为印度积贫积弱，可以随意“打压”。

2. 以不信仰宗教、无神论者眼光看印度，认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只剩下了古国，失去了文明，把印度与宗教和神灵相关的言行视作迷信、愚昧和落后行为。

3. 由于语言问题，研究印度时脱离其社会实际，对重视大众和传统的新兴精英（如 RSS, BSS 等）关注不够，不能正确研判印度最新“动向”。

针对上述观点，与会学者就化解中印之间“误读性”理解问题提出建议。

1. 进行相关中华藏文化研究和总结，如对冈仁波齐文化的中华藏文化特质、中华藏文化对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的影响等课题进行研究，以破解印度的藏文化归属印度文化圈的企图。

2. 对印度新兴精英，特别是 RSS、BSS 等组织进行深入研究，以非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身份理解宗教信徒和有神论者，力图争取研判印度相关政策。

3. 探讨进行中印贸易协定谈判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中

国经济的海外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姜景奎

2021年4月17日

博雅工作坊第 42 工作间

中国的印度观和印度的中国观

2021 年 4 月 10 日

本期工作坊的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王旭主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荣鹰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对构建一个客观的“印度观”的几点看法》的发言。

荣鹰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客观、理性的“印度观”。首先，他从自己的研究经历出发，指出中国的印度研究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对中国学者而言，研究印度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国家，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框架是基础，只有通过正确的方法和理论，才能比较客观、理性地看待印度。

第二，客观、理性地观察和认识印度，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框架和体系，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才更具连续性。但是在深入考察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仍需要把握一些变化中的要素和问题。

第三，把握变化中的要素和迹象趋势，需要观察背后的因素。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对印度的看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民族解放时的“同路人”到 1956 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 1962 年的边境冲突到 1988 年邓小平与拉吉夫·甘地会晤，中国对印度的认知直至 2020 年 6 月加勒万河谷冲突一直在不断变化、不断修正。在“后加勒万时期”，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因。

第四，中国和印度双方的认知也是一个彼此互动、相互塑造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将主观想象带入客观分析。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对此格外注意。

对于什么是客观、理性的“印度观”，荣鹰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是印度是中国的邻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重要“症结”也没有彻底的解决之道。二是印度和中国都是大国，两个大国比邻而居。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对于获得印度的认同和支持不能想当然。当中国认同印度是一个大国和邻国时，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三是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印合作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如何挖掘、探索合作是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的角度。四是中国对印度政策大的目标不应该有“单相思”的地方。对印度和中印双边关系要有合理的期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胡仕胜的发言主题是《印度“三观”的中国观》。他认为，观察印度对华政策有三个纬度：

一、从中印关系主要矛盾主线来观察印度对华认知。随着中印关系主要矛盾变化，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中印两国争取民族独立到两国建交之前，两国惺惺相惜，相互支持。彼时印度的对华认知是要与中国共同争取共建一个未来新世界，在反殖民的道路上展开合作。

第二阶段从两国建交至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之前，这时两国仍处在“蜜月期”，但也存在不和谐因素，主要是中国恢复在西藏完全主权的诉求与印度在西藏保留殖民特

权的诉求形成的尖锐矛盾。1954年两国通过签订《中印西藏交通通商协定》，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大限度地暂时化解了这对矛盾。在尼赫鲁的对华认知中，中国是一个“缺乏回报”的国家，因而他反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第三阶段是从1962年冲突到1988年两国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双方的主要矛盾是边界问题。在两国互相不来往的外交“冷冻期”，印度精英阶层认为中国背信弃义，甚至怀疑中国对印度进行革命输出，暗中支持左派武装和东北分裂。中国在印巴第二次、第三次战争中支持了巴基斯坦，所以在印度的认知中，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者，是印度最大的现实敌人。

第四阶段是1989年两国关系迅速正常化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阶段两国以合作求发展，互视对方为发展机遇，彼此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发展。这一时期两国身份认同高度契合，共同应对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压。中印关系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期”。

第五阶段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大力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之后，中印关系进入新时期。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其矛盾核心是秩序主张。印度要保留地区主导权，这与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形成尖锐矛盾，实际上是中印之间第三方因素的扩大导致了地区性的问题。印度越来越视中国为其崛起的最大威胁，新德里对北京的认识进一步敌对化，开始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评价中国。

二、从中美博弈的纬度观察印度对华认知。中美博弈暗含两大战略体系的博弈，即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胡仕胜指出，博弈主要集中在环印度洋地区，因此中印间的激烈碰撞不可避免。对于印度而言，加入“印太”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所获得的大国地位的提升，远远优于与中国发展合作取得的收益，这是印度非常重要且明显的身份认同变化。印度宁愿选择美国治下的秩序，也不希望和中国一道打造未来新秩序，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印太战略暗含的宗旨是针对中国，印度拥抱这样的战略必然和中国形成敌对关系。由于印度反对“一带一路”，对华认知日益负面似乎不可逆，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中美博弈的最终结果。

三、从印度“三观”即历史观、大国观、地缘观来观察印度对华认知。胡仕胜指出，中印之间“三观”不合。首先是历史观，印度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继承者”，而中国则要打破旧局，开启新篇。这种差异导致两国自建交起就带有“原罪”——西藏边界问题。其次是大国观，作为一个大国，印度认为和中国发展合作可以加强自身力量，但在这一过程中却成为中国发展的“垫脚石”和陪衬。因此，印度积极拥抱美国和印太战略，在很多方面都加大合作力度。最后是地缘观，中印两国毗邻而居，在这一状态下如何和平相处？如何相互支持？中国如何看待印度对华观？都是未来国内印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安平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世界音乐观下的印度音乐文化》。他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指出研究者要把中国和印度放在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基点上去观察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摒弃狭隘的认知。

安平指出，一个经典作品必须有民族文化认同、区域文

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世界文化认同四个维度。他用几个深入浅出的例子比较了中印文化的区别和互通，同时指出了印度音乐文化中的“世界性”。比如，印度古典音乐中的“梵音”就营造了一个大文化和大宇宙，演出者本身产生的声音是小宇宙，小宇宙和大宇宙要完全协调，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

安平认为，中印两国只有在真正的交往中才能加深理解。从世界音乐观念角度看，这种交往应置于整体文化之上。事实上，中国文化历史上受到印度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如今这种影响却逐渐被淡忘。中国对印度要有信心，印度对中国也要有信心，而其中的关键取决于双方的行动。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印相互认知中的美国因素》。她的考察对象是中印安全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时间是 1988 年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内容涉及意愿与能力两个方面。

李莉指出，从意愿看，由于中印之间存在边界争端、民主争端，双方均具备争夺利益或实现己方主张的强烈意愿。由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占优，印方更容易采取守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则有更强烈的冲动采取攻势。因此就意愿而言，中国对印度的威胁感可能来源于此。

从实力看，由于中印实力存在差距，且这种差距逐步增大，印度受到的威胁感与日俱增。正是预测到未来和中国差距的增大，印度采取守势。因此，印度强烈希望短期内可以解决边界问题，以此锁定收益。美国因素介入后，中印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美国因素抑制了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攻势。

另一方面，美国因素加强了通过印度遏制中国的能力，美国与印度合作的意愿随之增强。在此基础上，印度对抗中国的能力也得到了加持，同时美国因素也抑制了中国对抗印度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印度存在机会主义的心理，在边界问题上不仅积极推进维持现状的解决方式，在西段还采取新的前进政策。

李莉从两个时间段进一步阐述了中印之间的美国因素。第一个时间段是 1988 年至 1996 年，中印关系不断缓和的阶段。这段时间中美关系交恶，而美国也由于核问题、人权、克什米尔等问题对印度施加较大压力。因此，印度在当时与中国存在相互需求，中印相互威胁或紧张的意愿随之降低。在能力上也是如此。1993 年和 1996 年中印签署了边界协定，建立信任措施以管控边界。第二个时间段是 1998 至 2001 年，美国因素依然发挥了作用。印度希望借所谓“中国威胁”实现其核国家的抱负，但美国把印度写给自己的信公之于众，由此中美才就南亚核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李莉认为，当中美走近时，印度认为自身较弱，因此寻求改善现状；而在中国意愿和能力都强的情况下，印度也会“服软”。当下由于中美交恶，中国无论从意愿和能力上对印度而言都在下降，因此印度反而容易采取进攻性的政策。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钱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民主在当今印度是否走形？》他强调，印度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对其全面观察和看待。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印度民主的发展：

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和一个人。一个国家指的是英

国。英国虽然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但带来了西方政治文化思想，让印度接触到西方民主制。可以说，英国人在侵蚀甚至毁灭印度古文明时，也不不知不觉地让印度资本主义发生了萌芽，特别是印度上层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无形中培养出一大批印度民族资本家，为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个政党指的是印度国大党。国大党是百年老党，是印度民主影响的产物。印度独立后，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内外政策，民主制的大方向始终未变。印度的选举委员会也较为中立。

一个人指的是尼赫鲁。尼赫鲁对印度的民主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接受的是西方的精英教育，西方民主扎根在他内心。出于对西方民主的崇敬和反思，尼赫鲁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但在制度上却排斥苏联。

二是印度民主成就与精英阶层认同。独立之后，印度的民主制度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对印度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威胁民族统一和民族完整的内部因素也随之削弱，确立了“军不干政”的传统。在印度这样一个多元宗教、民族、语言、文化、种姓等共存的国情下，民主制度仍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且从未发生过大选丑闻或重新计票等事件。

三是民主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这一碰撞指的是印度社会的积弊在民主制度下的“水土不服”，表现为顽固的腐败问题、政治家族化、民主政治闹剧化、暗杀暴力等几个方面。

四是印度政治精英的反思。印度很多精英认为，与美国200年的民主相比，印度民主只有70年的历程，因此有很大

提升空间。而与中国相比，印度更需要的是良政，而非民主。在改进成效方面，印度仍然比较落后。

钱峰最后指出，历史上印度式的民主与印度式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但这一情况在当下莫迪领导的印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景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印度视域中的西藏》。他指出，印度已经意识到中国硬实力的强大和不可战胜，转而从传统出发制造舆论，即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强调印度对西藏占领的合理性，在争取国民支持的基础上争取国际支持。2017年3月下旬，印度意图将藏医药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中国反对。2018年，在中国将藏医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2019年印度则将藏医药更名为“索瓦瑞巴”继续申遗。此外，印度政府还批准在拉达克的列城建立全国索瓦瑞巴研究所，并称“这有可能是在拉达克正式成为‘中央直辖区’后，政府为该地发展作出的首批重要决定之一”，意图在国际宣传方面先发制人。

姜景奎认为，印度希望将藏南、锡金、尼泊尔、拉达克连成一线作为其统治该地区的合理方式，形成藏传佛教文化带，混淆藏传佛教与印度教文化之间的界限。印度很少谈藏传佛教和藏文化，而是将藏南、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作为印度文化中的藏文化因子，纳入印度文化圈，从软实力方面对西藏进行“文化统治”的合法化。但事实上，印度两大史诗等经典记录了印度文化与藏地之间地理上的隔绝。因此，为防止印度在文化方面混淆视听，中国的研究者要将中华藏文化与中华文化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叙述。

对于印度文化影响了藏文化的观点，姜景奎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在吐蕃之前，藏传佛教是在西藏形成后传到藏南、尼泊尔、拉达克、锡金等地的，同时藏传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不可能由下至上自印度传播，只能是西藏文化影响了印度文化。吐蕃之后，就佛教文化而言，也不是印度影响中国，而是中国从印度文化中“拿来”的。根据印度文字记录和考古内容看，冈仁波齐附近未见任何印度教的遗迹。若这一问题在中国学者中形成共识，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占据话语权。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印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不信仰宗教，印度信仰宗教，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印度人是有神论者。因此在与印度人打交道时，应该根据印度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采取相应的策略。

第三，是中华藏文化影响了印度，而非相反。国内研究者应该从历史中寻找证据，通过还原历史与印度沟通并为自身证明，这是最重要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旭的发言题目是《印度历史中教科书中的涉华叙事》。他首先解释了研究印度历史教科书中涉华叙事问题的缘起。首先，如何认识中国，是南亚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印度对中国认知中的负面因素，大多是通过教科书传输的集体认知，通过集体记忆共同构想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国和印度彼此认知的问题，需要考察印度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描绘中国的。

王旭指出，中印关系目前的几大核心矛盾包括边界问题、涉核问题、涉恐问题、入常问题等。这些矛盾可以分成两类，一是中印结构性矛盾，如边界问题，涉藏问题；二是涉巴问

题，中巴关系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自 18 世纪开始，印度对于穆斯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他者建构过程，由此造成了印巴之间的矛盾。中巴关系的发展被印度认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印度对于穆斯林，或者在对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穆斯林他者进行建构时，中国作为他者也被动参与了这一建构。由此，印度教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他者建构，和中印关系以及印巴之间、现实与理论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

王旭认为，通过研究印度教科书涉华历史叙事，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印度对中国的认知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印很难进行人文交流和友好发展。首先，印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建构不是 2014 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才开始的，其涉华叙事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通过比较国大党时期教育政策以及历史教科书涉华叙事，可以看出，印度一直在调整，且越来越偏负面，这与中印关系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他者建构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说明，印度政坛和社会整体右转，使得印度的对华认知问题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认知，更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的、民意的负面认知。

教科书中涉华的历史叙事包括三大主题，一是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二是涉藏问题；三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通过这三大主题，印度将中国塑造为蛮横的侵略者、印度的威胁和邪恶的红色恶魔形象，同时虚构并强调了西藏历史上的自治以及印藏之间的文化联系。一系列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了印度战略选择的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印度自 1947 年建国以来，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族建构努力尝试，和自

下而上对华认知的改变，形成了一个共振。而在加勒万河谷对峙期间，印度媒体自上而下的狂欢只是这种认知的现象和结果。

王旭认为，这种对华认知建构具体产生了以下问题：

第一，加速了对华认知负面转向。当前，印度上层精英在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而在民间，根据 2020 年印度的民意调查，2/3 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比巴基斯坦更大的麻烦，比例是 2016 年的两倍，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普遍担忧中国对印度的威胁。印人党的支持者更担忧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认为中印领土争端和中巴关系对印度造成严重困扰，阻碍了印度的崛起。

第二，印人党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教民族主义追求建立“大印度”，而这是建立在印度文化建构和想象的基础上，由此导致对华的负面印象。

第三，催生了印度对华强硬政策。一是推动对华脱钩，二是实行冒进边界政策，三是加大对冲“一带一路”。目前的印度政策决定了美印关系走近，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中印关系带来的负面代价。

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丁皓的发言题目是《印度对华认知与对华战略》。丁皓从两个问题切入，考察中印之间的认知。

第一，过去几年研究机构对印度的民调。2017 年 6 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印度对华友好程度在下降，印度人民党和精英阶层都更为反华。2020 年，印度的民意调查基本结论为，70%的人认为中印开战印度能获胜；84%的人不信任

中国；59%的人认为通过战争能解决中印边境问题；高达 91% 的人赞同印度对中国 APP 禁封令等等。可见，印度民调对华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第二，近些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得出的印度对华认知。中国学者一般将印度涉华人士分成三派，一是友好派或知华派，代表人物是印度共产党、左翼学者、和平主义者、反美主义者等。二是温和派或中间派，即政府官员、商界、学界、媒体等，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但安全上对中国警惕。三是对抗派或鹰派，即印度军方或者情报界、安全界、战略界人士。

丁皓指出，上述两种认知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受时间、立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看待印度的对华认知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即综合看、全面看、历史看、辩证看。他从印度战略文化的角度对印度的对华认知提出几点看法：一是考底利耶现实主义的传统和远交近攻思想对印度的战略选择影响较深。二是英殖民传统对印度影响也很深，印度的安全思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带上其深深烙印。三是印度的大国观、大国情结、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对其心理影响很深。

在此基础上，丁皓根据苏杰生的《印度之路：应对未知世界的策略》以及施雅姆·萨兰的《印度如何看世界：从考底利耶到 21 世纪》两本书，对印度的主流对华观点进行了归纳。首先，印度对中印历史上经贸历史联系了解不多，且印度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普通人对中印历史文化认识不够，相反却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的交往是一种美化，印度对中国的帮助更大。这就造成了印度民众对中印两国历史上的密切联系一无所知，却认为两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

形态有巨大差异。其次，对于当代史记忆深刻，尤其对于中印冲突耿耿于怀，由此引发了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担忧。第三，对中巴关系的不满。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对印度的挑战，涉及到中国对印度及其地位的认可问题，对印度不够真诚。最后，中印边界争端。印度将边界问题视为中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关键，将其视为双方在世界和地区加强合作的必要步骤。目前印度认为是中国的举动导致了两国争端，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同时，印度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因此，现阶段印度认为强硬是必要的，哪怕爆发战争。

丁皓认为，上述印度涉华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基本反映了印度认知中的两国关系的本质。在印度外交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现实主义看世界，即对华灵活务实，不排斥跟美国结盟，不排斥采取任何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印度发展利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蓝建学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新时代推进中印关系模式的思考》。他认为，自2004年起，由于印度政府不是多党联合，其外交政策辨识度很高，外交政策也较为稳定。近20年来，印度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力图从两个方面作出突破：国族重构和外交突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逐渐增长，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和印度两国都在发生巨变，中印关系也走向了新时代。总体而言，印度对中国主权、安全发展的挑战或影响更加明显了。

第一，近20年来，印度外交和中印关系发生了明显的

嬗变。印度经过深思熟虑后，开始和美国进行战略捆绑，未来这一思路应该不会改变。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度逐渐渗透到美国的外交和安全体系中，过去的战略自主能力势必被侵蚀。因此，对于印度能否保持战略自主的判断还需根据实情进行调整。

第二，印度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和冒险性极为突出。当前中印关系在逐步脱钩，这并非印度的突发奇想，而是经过其对于本国和地区国际形势变化所作出的精心算计，这也是中印关系的新变化。

第三，近些年来中印在共有的周边地区的战略博弈在激化，国际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合作的动能在衰减。比如东南亚、南亚、中亚、印度洋甚至东非等地都是中印的战略重叠区，竞争明显在加剧。在多边舞台，过去中印在不结盟运动、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南南合作和协调新兴经济体等方面较为紧密，但近年来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安理会改革、克什米尔地区、新冠疫情溯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交锋，多边舞台上中印合作越来越困难。

综上，当前中印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内在的动力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进行重新盘点或重新认识。在两国国力共同增长的背景下，中印两国如何探索共处之道？蓝建学提出了“中印模式”，即在双方领土主权争端和战略重大分歧尚未解决的前提下，中印两国仍然有能力管控争端，不断创造共同或者共享的利益，尽量避免大国兴衰导致的冲突，维护两国关系稳定。

蓝建学指出，推动这种中印关系模式需要遵循四点原则：

一是共同“演进”。在和平竞赛中实现战略“演进”。两国同时发展壮大势头不会停止，双方也没法完全压制对方，外部势力也很难阻断双方崛起的过程。所以中印两国只能保持长期的共同“演进”态势，做不到相互成就，至少做到相安无事，公平竞赛。二是习惯恩怨。双方应准确对照、协调各自的核心利益关切。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建立管控意识，管控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三是超越冷战思维，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做到上下联动、上下一致，这是建立新时代中印关系的必备条件。四是务实合作，最大限度地建立两国共同利益纽带。加强中印经贸投资和人文往来，最大限度建立两国共同利益纽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楼春豪的发言题目是《新冠疫情下的印度“世界观”与“中国观”》，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度国内“水深火热”。近期，印度疫情导致的死亡率升高，同时接种率较低，未来很长时间内疫情都将对印度产生影响。但印度对此比较自信，国际上也认为它能够危中寻机，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楼春豪指出，印度认为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失，对于印度而言是遇到了一个在中美之间渔翁得利和推动改革的机会。同时，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塑，这个过程中印度认为自己有望成为制造业替代中心。此外，产业链脱钩政策导向也是明显的变化。印度希望利用产业链重塑的机会，减轻对华产业链的依赖。

第二，印度希望借疫情推动疫苗外交，提升全球影响力。

在不久前举行的美、印、澳、日峰会中，四国共同发表了四边精神文件，同时发表了三项合作清单，提出建立疫苗伙伴关系。但由于3月以来印度国内疫情非常严重，印度暂停了对外出口，疫苗外交也有可能因此而夭折。

在疫情的背景下，印度的“中国观”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开始的幸灾乐祸到“羡慕嫉妒恨”。过去几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上升较快，但是2020年以来疫情导致的产业链重塑，加上边界问题、经济民族主义抬升等等，印度出台了对外歧视性政策。楼春豪指出，贸易额并不能反映中印经贸关系的全部，印度对华脱钩趋势仍然成立。

第三，中印从全球治理和多边机制合作者变为了竞争者。当前，多边机制西倾，印度向美国靠拢的趋势比较明显，原因有三：一是中美博弈加剧给印度提供了空间和冒险余地；二是美印合作的收益大于中印竞争的损失；三是美国主导的秩序比中国主导的秩序对印度更为有利。

楼春豪最后指出，印度希望在全球治理发出印度声音，提供印度方案，包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扮演世界药店的角色、开展疫苗友谊外交等举措，这是后疫情时代印度在国际上的筹划。

信息工程大学东南亚南亚北非系副教授廖波的发言题目是《虚假信息对印度人“中国观”的影响》。在谈及研究缘起时他表示，2020年12月欧洲一个民间组织发布了名为《印度纪事》的报告，披露印度某个组织长期生产虚假信息，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个组织网络庞大，操控了很多虚假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它甚至影响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出

了对中国的不利提案。该报告表明，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印巴之间和中印之间展开，深深影响了舆论战，已经成为一种非和平行为。遗憾的是，国际媒体对此没有更多关注，中国政府也没有提出抗议。

廖波表示，针对这些数据，其团队进行了相关调查。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大量事实证明印度有系统地在国际舆论场散布不利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新闻，这客观印证了《印度纪事》所言非虚。

廖波总结了印度抹黑中国和巴基斯坦新闻的特点：第一，体系性地生产传播虚假新闻，印媒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在进行统筹安排。第二，生产虚假信息数量巨大，且毫无底线。2020年上半年，印度人从网站上看到的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虚假报道可谓是毫无底线，甚至最早抹黑中国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行为也是出自印媒之口。第三，印媒的虚假信息造成的国际影响巨大。由于印度人口众多，英语普及率高，印度人的话语权很强。因此，印度媒体制造的虚假信息，经过印度网民的放大，就会形成强烈的共振效应，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廖波认为，印度制造虚假信息目的有二，一是印度国内制造反巴、反中的民意；二是在国际社会制造反巴、反中的舆论。印度国内的组织和机构“黑”中国不遗余力，且“深耕”了15年之久，经过酝酿和发酵，这些信息会形成非常汹涌的反华民意。

最后，廖波对这一行动背后的操纵者进行了研判。他同时指出，随着印度对中国、巴基斯坦的舆论攻击、信息攻击、

黑客攻击行为大幅度的提升，中国学者对此问题应特别关注。

河北师范大学王春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印度观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以女性游记为例》。王春景指出，在涉及印度游记时，女性和男性不同。在余秋雨、于坚等男性作家的印度游记中，或表现为一种非常狭隘的印度立场，或赞美印度，但其着眼点均置于印度落后的方面，所针对的仍是印度的负面形象。

不过，女性印度游记对构建正面的印度形象作用比较特殊。王春景认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女性印度游记面世较晚。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女性印度游记是冰心的《印度之行》，但彼时在中印友好的大环境下，情感、心理、人物关系等个性化表述较少，写作较为模式化。大量涉及女性的印度游记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据统计，2005年到2015年，共有21种女性游记。从数量可以看出，在这期间中国赴印度民间个人交流较为活跃，与前述的负面紧张关系并不一致。

王春景指出，这一阶段的女性游记，大多不代表专业人士的认识，其描述基本是对印度直接的认识，且以情感性、主观性为主。与此同时，王春景借鉴表面现象学、女性文学、游记研究等理论，认为印度游记中两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因此在游记中呈现出不同的异国形象。女性看异国时往往呈现出新的主题，这是由文化语境决定的。女性更关注个人、家庭、女性地位，这在印度游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中国男性在印度接触得更多是公共世界，很少进入私人领域，不具备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敏感。但在21本著作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个人的体验，对印度历史宗教的知识介绍较少。

王春景认为，女性印度游记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印度被描述为一个精神家园，其灵性特征得到凸显。很多作者希望通过印度的宗教文化化解心灵的压抑和心理的苦闷，从印度寻找心灵的宁静，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动机。

第二，女性游记描写的印度爱情经历往往充满激情和爱，将其描述为新鲜、美好、迷人的感情体验，这表现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和中国女性的进步。

王春景在结论中指出，女性的印度游记侧重于记录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情感和心灵的体验，其中公共性的文化成见很少起作用。她们以个人性的书写，塑造了在脏乱差之外更为正面的印度形象。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金永丽的发言题目是《印度两种中国观》。她对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拉杰什·拉贾戈帕兰主笔的报告《印度的战略选择——中国和印度的权利均衡》和沙希·塔鲁尔 *Pax Indica : India and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一书中关于中印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拉杰什·拉贾戈帕兰的报告《印度的战略选择——中国和印度的权利均势》的中心论点是，与美国结盟是印度最好的战略选择。中国与印度地缘上的接近，对印度安全、亚洲的地缘政治，甚至全球利益都构成巨大威胁。印度应在不稳定状态中确保自己的利益。

金永丽总结了拉杰什·拉贾戈帕兰报告的几个要点：第一，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很多挑战，包括直接的军事威胁和边界问题。第二，中国在新建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在增强，有可能伤害到印度的利益，阻挠印度的目标。第三，中国与巴

基斯坦结盟，深化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对印度在南亚地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过去几十年间印度在南亚都是处于主导地位。第四，中国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影响力，这可能会损害印度的利益。报告认为，印度的地理位置使其主导亚洲变得不可能，因为印度不能主导亚洲，所以印度要确保其他强国也不能主导。虽然美国从理论上也会变得具有压迫性，但由于美国距离印度很远，所以其威胁会小很多。印度和美国没有大争端，尤其没有领土争端，和美国结盟有很多好处。

金永丽认为，拉杰什·拉贾戈帕兰的报告集中反映了印度国内右翼的反华思想，将中国看作印度实现霸权、成为世界强国的绊脚石，把与美国结盟视作其实现大国最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塔鲁尔则反复强调印度软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印度软实力是深层次的。塔鲁尔对印度内部多元性非常推崇，而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僵化。

金永丽指出，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塔鲁尔谈及更多的还是竞争。他通过修路、修大坝、奥运会等方面证明，印度与中国的体制完全不同，二者没有任何可比性。印度官僚体制僵化，中国体制高效；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要遵循繁文缛节，而中国则显示出开放态度；印度争吵不休，政党难以驾驭，中国的共产党体系自上而下运转良好。因此，塔鲁尔认为，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之前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中印两国仍存在合作的空间。在敏感边界问题上，新德里无意迎合北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经济影响力是一种例外，其他国家难以学习。

金永丽由此提出两点思考：首先，拉杰什·拉贾戈帕兰和塔鲁尔受西方政治地缘思维影响较大，无论是将中国作为战略敌手，还是站在美式民主价值观的角度审视中国，都没有跳出西方思维，他们不具备泰戈尔式的世界主义视野，缺少尼赫鲁的亚洲主义视野，更缺少人类文明的视角。其次，两位作者都是站在批判他者的视角看问题，很少站在对方视角看问题，这样难免有误解和误判出现。

印度舞蹈家金珊珊的发言题目是《从艺术视角看中国的“印度观”和印度的“中国观”》。她首先提出了对中国的“印度观”的看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印度毫不了解，常常道听途说，导致误解加深；另一部分则对印度文化感兴趣，从而产生了感情。

金珊珊从自身学习印度古典舞蹈的经历出发，指出舞蹈虽是外观，却能反映出内心的力量，更像是一种修行，一种信仰，且与宗教无关。印度的艺术可以让人从精神层面开悟。

金珊珊接着指出，印度对本国的文化艺术非常自信，这在生活中随时可以体现出来。同时，印度人尊敬艺术家，这是印度文化和艺术得以传承下来并传播到世界的原因，也是印度软实力的一部分。

金珊珊认为，与印度相对，中国在注重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的宝库。同时，中国人追求速度，没有耐心。感受自然连接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美德，但这一传统被极大地忽视了。在教育上，印度学生从小就开始学习印度古典音乐，而中国的音乐教育更为西式，没有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于印度的“中国观”，她认为，在印度的认知中，中国经济上很强大，但对中国的艺术层面却知之甚少。金珊珊指出，中国的艺术和大众生活实际上是脱钩的，但在印度，宗教是艺术的源泉，又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

金珊珊最后作出总结，认为文化是沟通情感最好的桥梁。上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建立了东方歌舞团，开创了文化外交道路，今天中国依然可以延续当时的道路走下去，做更多的文化普及，展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大规模弘扬中国的太极文化、古典音乐和古典舞蹈。只有加深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尊重，才能促进两国友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的发言题目是《读〈印度经济调查报告〉观印度对中国经验的认知》。刘小雪指出，《印度经济报告》是印度唯一的官方报告，非常可靠、权威，它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政治分析家以及商业人士。该报告是由印度财政部经济司的经济科协调各方面的数据汇总而成，与 IMF 和世界银行对数据对接，因此非常全面。

刘小雪详细分析了报告内容。她认为，该报告内容很全面，内容逐年增加，且在向世行研究型报告转变。自 2014 年开始，报告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展望前景，基于此政策建议；下卷分析经济现状，主要是对现状的描述。在有关中国的内容分析中，报告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国际经济环境重要构成因素。在国际部分，中国因素作为国际环境的构成部分越来越突出。第二，作为

印度经济发展统计意义的参照物。比如将印度农业、劳动力就业、劳动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的数据进行比对。第三，作为印度发展政策和可借鉴的对象，这部分对中国分析最多，印度仍没有脱离东亚模式。

刘小雪以 2016 年和 2017 年为例，对数据的比较进行了细致说明，认为评级机构对中印两国主权债权信用评价有失公允。在制造业方面，报告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这部分只占生产商品价格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影响来自于物流成本，而中国的物流成本要低很多。

此外，刘小雪还介绍了第二卷统计数据的部分。她指出，该报告各章节都涉及与中国的比较和对中国的分析，以此对照寻找印度学习的可能性，提出问题以寻找可能赶上中国的机会。同时，报告还提及中国的扶贫工作，将中国的路径作为参考。

刘小雪最后对印度人的“中国观”中最重要的方面进行总结。她指出，印度的“中国观”是一个多维度的认知。对于研究者而言，民众意见不重要，关键是应认识到印度精英对中国的了解和其观点的重要性。

发言结束后，参会人员就上述发言内容进行了探讨。刘小雪指出，东亚模式是投资引导为主，政府发挥直接作用，制造业非常活跃。这方面印度要加大投资，提高国内投资效率，改善基础设施，放大劳工政策。目前印度在投资和制造业方面已经向东亚模式靠近了。

王旭指出，一方面中印关系的传统结构性矛盾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同时印度在学习东亚模式，包括导向型经济和

国家领导，最终中印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相同产生同质化竞争，因此必然要推行去中国化，在此基础上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又增加了，这是未来中印发展的一大隐患。

蓝建学指出，中印在艺术文化上的相互欣赏不仅没有转化为政治关系上的理解，反而加剧了关系的恶化。而姜景奎则认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对印度文化艺术友好的态度主要基于对佛教的理解，而印度对中国文化礼教的认同则是基于中国接受佛教的缘故，而非基于现实和现状，加之中印两国不少民众不愿深入了解彼此，因此政治上无法形成相互的认可，造成了历史和现实脱节的局面。中印两国在信仰上的差异更是导致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对此荣鹰指出，中印之间应多对话、多交流，不能站在自身的角度看待和想象对方，在精神层面或文化层面仍需多多学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景奎教授在会议总结时指出，从中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印度的中国观，不仅涉及到区域国别、政治、外交关系等领域，还深深地关联着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中印关系绝不能停留在政治、文化上，印度精英孜孜以求分析、研究中国固然值得重视，但民众的误解更为重要，且将会影响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因此，“中国印度观和印度中国观”是值得两国学者值得长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